

一滴敢报江海信 百折再看高潮来

——对话诗人贺敬之

本报记者 高 昌

记者手记

贺敬之，著名诗人、剧作家，曾任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代部长等职。1924年生于山东峄县（今山东枣庄台儿庄）。14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15岁开始在报刊发表文艺作品。16岁到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17岁入党。21岁（1945年）和丁毅执笔的我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获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这是我国新歌剧发展的里程碑，作品生动地表现出“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一深刻的主题。创作有《回延安》、《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等一大批脍炙人口的诗歌，著有诗集《并蒂没有冬天》、《朝阳花开》、《放歌集》等。由他作词的歌曲《南泥湾》、《翻身道情》等至今传唱不衰。



本报记者 喻非卿 摄

文艺方针政策的依据。

《讲话》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系统表述。当然多年后又又有发展，比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等。《讲话》科学地总结和揭示了人类文艺发展史的一般规律，又突出强调和论述了无产阶级文艺的特殊规律。如果否定前者，文艺发展就失去了借鉴和继承的依据；否定后者，无产阶级的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就失去自主性、独立精神和创新精神。这篇经典文献体现的不是哪一个人的意志，而是和文艺的客观规律性相一致的，是古今中外文艺现象、文艺发展的规律性的反映，特别是无产阶级文艺的反映，所以才在民族文艺发展史上发挥了那么大的作用，有那么强的生命力。不仅为中国进步文艺家所接受，而且还为许多外国进步文艺家所接受。比如我早就听说韩国作家也在学习《讲话》。

《讲话》是关于革命文艺一个历史的总结，其中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从“为什么人”和“如何为”两个方面，给包括我在内的广大文艺工作者指明了正确方向、前进道路和科学方法。这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问题、原则问题。这正如许多同志经常论述的，它解决了文艺与生活、文艺与人民、文艺与政治等重大理论问题，也对文艺工作者的生活、学习、创作和理论批评中一系列具体问题的正确解决提供了思想武器。

记：过去的一些老延安谈到《讲话》，常常说它是学习、继承和坚持，而您刚才谈到的“自主性、独立精神和创新精神”让我感觉很新鲜。

贺：革命文艺也要讲“自主性、独立精神和创新精神”。前些年曾经有人说：“要写一些让外国人喜欢的诗歌，不要写叫外国人笑的话”。

东西。”这样的论调值得我们注意和深思。他们提到的这外国人是什么样的外国人？我们都知道“三个世界”的著名论断，知道每个“世界”里都存在着不同的阶级和阶层。据我所知，也有许多外国人很喜欢我们的革命文艺作品，并不笑话我们的革命文艺作品。我们的文艺家一定要有自主意识和自主精神，毛泽东文艺思想给了我们充足的理由。艾青说过：“人们不喜欢我的歌，因为那是我的歌。”这个“我”就是“我们”。我们的作品不仅思想内容要反映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而且也要吸收其中有益的东西，但不能用他们的观点取代我们，尤其不能拿资产阶级的文艺观点，来代替我们的审美标准。

记：您在延安写的一首诗歌中说过：“这里，/没有桂冠。/在今天，/诗，从绣花的笼子里/走出来。/正如我们重新解释了人……”这种“重新解释”，是否可以理解为对“为什么人”和“如何为”这两个问题的重新思考？

贺：你提到的那首诗歌写于《讲话》之前，当时关于“为什么人”和“如何为”这两个问题的思考还不是那么明晰。

“为什么人”是有方向和意识形态性的。过去的某些机械的理解和解释固然有些片面性，但文艺创作主观上确实有一个“为什么人”的问题，需要认真思考。世界观和文艺观有着密切的联系。文艺观不能脱离世界观，文艺思想不能脱离自己的立场，特别是革命文艺更为如此。在纠正了以往某些“左”的错误理解的时候，也有人提出“文学就是文学”“文

学不能为什么”的观点，甚至提出“躲避崇高”“走向自我”等等议论，并且这种议论在当前文艺界的某些范围里甚至还占优势。我认为这种观点需要批评和澄清。

说到“重新解释了人”，我想特别谈一下作家的党性问题。一个党员文艺家，首先是文艺家还是首先是党员？当年延安整风期间，有位中央领导同志也曾强调提出过这个问题。我考进鲁艺没几天，就从老师和同学们那里知道了俄罗斯别兹兹斯基的一句诗：“我首先是一个布尔什维克，其次才是一个诗人。”一位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人生理想、人生价值怎样实现？在创作实际中采取什么态度？这就自然而然地会产生一个人人与集体、与革命事业的关系的问题。比如左联烈士殷夫的作品，鲁迅说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存在……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我们大家熟悉的叶健、陈然等烈士的诗歌，也是如此。他们的作品是用鲜血写成的。和平时期，不能要求所有的作家都去像他们那样抛头颅、洒热血，但也有一个“大我”和“小我”的关系问题需要摆正。比如历次与自然灾害作斗争的时候，就有不少共产党员文艺工作者冲在第一线，不仅做奉献，甚至要做出牺牲。

有的同志认为文学是人民的文学，不是党的文学，所以不应该提党性。这种提法是大有问题。《讲话》中多次提到“党性”这个词。社会主义文艺的党性与人民性，从根本上来说是一致的。党员作家的党性表现有许多方面。我们的文艺队伍中的许多党员作家是做得很好的，但也有少数人就不行了，他们抛弃了党性，不遵守党纪，不以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却还要保留一个党员的名义，要享受“党员作家”的光环。

记：《白毛女》、《放歌集》、《南泥湾》、《翻身道情》……您创作出的很多“与史同在”的优秀作品，大都是在《讲话》发表之后。请问《讲话》精神对您的个人创作有什么影响？

贺：“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这“手中的书”首先就包括《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内。作为一名革命文艺工作者，我是在《讲话》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讲话》作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艺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和社会主义宏观文艺学的经

典文献，作为中国革命文艺和社会主义文艺的理论纲领和行动指南，一直是我生活实践和创作实践的最重要的教科书。首先是感情、立场、世界观，全身心地转移到工农兵方向中去，和最大多数的人民同命运、共呼吸。为人民写，写人民，让人民去评定。当年参加集体创作，执笔创作《白毛女》的时候，我还是21岁的年轻人，我是充满感情和激情去创作的，剧情中的很多地方，我自己都掉了很多眼泪。革命文艺当然首先要革命内容，但是光有革命的内容没有艺术的魅力也不能感动人。这就是毛泽东所强调的革命的内容和完美艺术形式的相统一。

记：《讲话》发表已经69年了，在今天还有什么现实意义？

贺：科学态度是既要坚持，又要发展。前提是坚持那些实践检验过是正确的东西。这正像任何进步的历史现象都不能超越自己所处的历史条件的限制一样，《讲话》既有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也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但《讲话》的基本原则，基本精神是永存的，无疑对我们今天仍然有巨大的指导意义。对其正确的东西，不能做教条主义的理解，不能简单化、庸俗化。而对于其中有的提法，由于历史情况的变化、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前进，我们今天需要在坚持其基本精神的前提下做某些调整，比如把“为工农兵服务”调整为“为人民服务”，把文艺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调整为“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

说到《讲话》的现实意义，我认为《讲话》是永远屹立在中国人民心里的一座丰碑。《讲话》精神是永放光芒的。对于今天的很多文艺现象，从中仍然能给我们许多新鲜的启发和正确的回答。《讲话》之后出现了很多成功的文艺作品，培养一大批文艺家，这些作品和文艺家不仅当时受欢迎，经过一段较长时间的历史检验后，仍然受到今天的人民群众的喜欢。有的人只要一提到《讲话》，就认为是过时了，“左”了，这是一种错误的认识。

至于我在新时期以来写的一些新古诗，并不是自己要创造什么新品种，而是表达自己的心声。其中不仅仍然是贯穿着《讲话》的血脉，还有直接怀念《讲话》的篇章。我歌颂改革开放同时也有忧患之思，但是信念绝不动摇。“一滴敢报江海信，百折再看高潮来。”我是由衷的。不这样，那就不是我了。

时评

过美国者，常嗚言曰，彼国无史，固百年建筑以为古，树碑立传，以彰邈远。我华夏之地，底蕴深厚，千年古迹、风流人物，不可胜数。然，纷纭繁杂，后辈辨之不容，或囿于利益，求伪弄真之举，大行于世，指鹿为马者、暴殄古物者振振其辞。国之宝见弃，国之文曲解，诚可痛哉！

大千世界，无奇不有。此地此时，有自续历史者，生拉硬扯强与虚无缥缈之孙悟空攀亲叙旧，自诩其为斗战胜佛之老家，轰轰烈烈、大张旗鼓欲建主题公园；有自断历史者，立足遗址之上却罔视之，遮遮掩掩、糊里糊涂“开发”文物古迹。

此二事反之异之，登台演绎，各展陆离，一事现于连云港，一事发于大连。前日，连云港（深圳）文化（旅游）产业投资说明会于深圳。连云港官某某某曰，连云港者，孙悟空之老家也，且举世公认。七月，将举四十亿之巨资造千亩之园，号之曰西游记文化主题公园，以纪行者。欲二年完工，辉煌煌煌，树四大大型主题公园之圭臬。反观大连，行房地产开发之实，谋建花园、度假村，举国所珍视之旅顺郭家村文化遗址毁为瓦砾。

一建一拆，冲突自起，何也？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建、拆之间有道贯通，其名曰“钱途”。此道风光无限，令人遐想，然岔道叠出，误入歧途者绝非少数。由是之，有心忧一方百姓者，迷途其中，终不知强国富民之道何在？

强经济、搞建设，无可厚非。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凡事皆有底线，行国法不容与众生认知相左之事，窃以为不可！孙悟空者，虚幻之人也，其老舍存之《西游记》中，世间岂有其府第？为求轰轰烈烈，同侪昭昭之实，树伪文化之旗，大敛其财，实为子孙大圣故土多情？至若破坏文化遗产，视之如草芥，携宝贱卖于开发商，实为向金元投怀送抱，且不惜身触刑律。

悟空被尊，以其有价于市也；遗址被毁，源其阻挡财路也。一取一舍，其善广播，陷害深远，不可不早弃之。故，文化价格论，断不可取；续、断历史之利益情结，需审慎之。

续、断历史之利益情结

秦毅

悟空被尊，以其有价于市也；遗址被毁，源其阻挡财路也。一取一舍，其善广播，陷害深远，不可不早弃之。故，文化价格论，断不可取；续、断历史之利益情结，需审慎之。

观点

从审美文化研究到审美文化生态研究

审美文化生态研究提供了不同于文本化的审美文化研究的另一种学术视野和研究思路。这种研究从地域差异、传承演变、群落认同和文化空间的联系中考察审美文化发展演变过程的现实活态特征与当代中国的特殊性，为审美文化研究打开新的视域和研究空间。比如，作为大众重构的想象性体验，乡土文化正在成为当代审美文化生态的一部分，因此民俗美学不仅要关注作为乡土文化传统的审美体验，而且要研究乡土文化传统如何

进入日渐都市化的当代文化空间并且在生成着新的审美文化特征。审美活动的群落化为美学和文艺学研究提示了一种非经典的社会学视野，在此视野下研究审美活动的目的不是寻找普适性的规律或普遍的美学理想，而是要理解不同文化群体的审美活动差异，在不同群体的冲突与对话交流中导向对当代审美文化生态的全面认识。

——摘自《学术研究》2010年第11期，高小康文

当代散文现实性不足

当前散文的最大弊端，是现实性不足。现实性的不足，主要有如下一些症候：一是文化大散文越来越远离现实和心灵，存在知识崇拜，追求大题材和大感情以及与此相对应的长篇幅，忽略了个体的体验和心灵的渗透，缺少具体可感的生活细节等弊端。二是老旧平庸的写作意向、审美趣味仍在侵蚀着我们散文的肌体。一种沉迷于历史材料和知识的纸上写作，一种“恋乡忆昔”的童年情

结，一种满足于游山玩水、走马观花的肤浅创作倾向，正在侵蚀着当代散文创作的肌体，并使真正的优秀散文淹没在这片腐酸、老旧、肤浅平庸的汪洋大海之中。三是商业化写作成为篇幅，忽略了个体的体验和心灵的渗透，缺少具体可感的生活细节等弊端。二是老旧平庸的写作意向、审美趣味仍在侵蚀着我们散文的肌体。一种沉迷于历史材料和知识的纸上写作，一种“恋乡忆昔”的童年情

——摘自《文艺评论》2010年第5期，陈剑晖文

近年大陆摇滚歌词的阴柔化趋向

摇滚从起源到发展，都有强烈的“雄性”特征，其音乐与歌词都以激昂狂放、张扬个性为主调。在歌词的文本性别上，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摇滚歌词，体现的是性别无意识。类似崔健《一无所有》这样的歌不属于专注“我与你”的爱情，在爱情背后是一种存在身份定位意义的追问。从80年代中期诞生起，摇滚歌曲在中国就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总是以一副超越凡俗人世的姿态出现，向精神的高度飞升，摇滚本身成为对俗世世俗批判的文化符号。

张楚的《姐姐》代表了一个巨大的转折。这是一个以男性“我”为叙述主体的男歌，但是阳刚之气被搁在一边，出现强烈的女性依恋。直到全部由东北汉子组成的“二手玫瑰”一出场，其性别颠覆意识就非常耀眼，这种性别颠覆同样体现在性别含混的歌词上。摇滚作为男性符号，表达的意义越来越暧昧，阴柔化倾向越来越强。倒是21世纪初的女性摇滚，在文化缝隙中找到了女性对抗策略：阴柔化不是女性化。

——摘自《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6期，陆正兰文

开栏的话：“红色经典”作品充满着凛然正气、火热激情和生命活力，蕴含着爱国主义、理想主义和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教育了一代又一代读者，也成为当代文化经典的重要组成部分。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本报理论部拟刊发“重读红色经典”系列文章，让红色经典著作重新走近当代读者。重读的目的不仅仅局限于怀旧和感慨，更重要的是激励人心，振奋精神，高举旗帜，开创未来。

永不凋谢的生命诗篇

——重读《革命烈士诗抄》

刘 章

面对时下诗的现状，我重读了由诗人萧三主编，也是诗人萧三寄赠的1962年增订本《革命烈士诗抄》，那句句是诗，字字是血。如游龙般天骄，如雷霆般响彻（谢觉哉题词）的诗篇，让我一阵一阵热血沸腾。

《革命烈士诗抄》收集的是新中国成立前30年间，即“五四”以后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一部分革命烈士的遗作。作者有李大钊、方志敏、瞿秋白等诸多革命家，有陈辉那样的诗人，也有普通工农兵出身的烈士，他们面对侵略、压迫、屠杀，“半壁江山成血海，满地干戈斗沙虫”（袁国平），“火花如流电，血注如洪泉。骨堆成了山，肉腐成肥田”（柔

石），“满地狼犬，遍地荆棘”（蓝蒂裕），“春天是强盗的，穷人永远生活在冬天里”（余祖胜），“监牢啊，便成了反抗者的棧房”（蔡梦慰），高呼着：“哦，民族，苦难的亲娘！”（林容路）不像时下某些新潮诗人所谓的“绝诗”那样，说什么就是诗，不为了什么，不说明什么，到语言为止……而是愤怒出诗人，为了祖国的独立、富强，为了人民的生存、自由、温饱，为了“把祖国的荒沙，耕种成美丽的花园”（蓝蒂裕），为了“火车在铁路上奔驰呜呜长鸣”（鲁特夫·木塔里甫），为了“怒发而今独赋诗”（朱学勉），他们投身革命，用投枪、匕首与敌人战斗，他们以诗言志，呐喊，呼唤，唤起民众，他们的行为和语言都是热血诗篇！他们为人民的自由失去自由而无悔，“为了免除下一代苦难，我们愿意把这牢底坐穿！”（何敬平）“窃恐民气摧残尽，愿把身躯易自由！”（续范亭）“面对

死亡我放声大笑，魔鬼的宫殿在笑声里动摇”（陈然），“已披生死寻常事，留得豪情作楚囚”（恽代英）……这些写坐牢的诗电光一闪，成为焚烧罪恶监狱的火焰！这些诗人首先是战士，他们热爱生命，珍惜生命，为国家，为民族，他们深知“文明不许探囊取”（萧次瞻），要奋斗，要牺牲，“我死国生，我死犹荣”（赵博生），他们视死如归，“慷慨做新鬼，从容做死囚”（陈法轼），为革命，为人民，不怕万死千伤，“万死千伤鬼亦雄！”（袁国平），他们用生命呐喊，用生命写诗，献出了“属于我的一生只有一次——生命”（鲁特夫·木塔里甫），他们的诗句成为永不凋谢的生命！“明月照秋霜，今朝返故乡，留得头颅在，雄心誓不降！”它的作者湖北麻城熊瑾璜烈士与另外两战友牺牲时都只有22岁，当时乡亲们痛惜地说：“三个为穷人而死的好汉，合起来才只有66岁呀！”吉鸿昌的“恨不抗日死，留

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是用树枝写在刑场的泥土上，与大地同热，夏明翰的“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自有后来人。”“自有后来人”成为真理和正义后继有人的流传绝唱！这才是吐气如虹，这才是连天接地浩然正气！这才是诗歌表现生命的楷模。时下新潮诗说诗的表现生命，是指人体出汗、撒尿等感受，不谈社会性，是一种歪曲。烈士的诗是高山虎啸，是长天鹰鸣，我们每个写诗的人面对这些诗句都该对照、思索：我应该发出什么样的声音？

《革命烈士诗抄》有新诗，有旧体诗，有民歌，有歌词，形式多样，有新诗人殷夫、陈辉长短句的白话新诗：“在敌人的屠刀下，我不会滴一滴泪，我高笑……在埋葬我骨骼的黄土堆上，也有爱情花朵生长。”（陈辉）也有魏婉的民歌：“又吹号角又拿枪，咄多士兵来送葬。咄多官员做孝



重读红色经典
——纪念建党90周年